

日本的右倾化与中日关系

何晓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 北京 100007)

摘要: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有国内和国外两个成因。国内保守势力要求“正常国家化”,走军事大国的道路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国内因素。东亚权力格局变动,日本恐惧中国崛起,要求发挥军事作用,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外部环境因素。随着美国实力衰弱,日本不相信美国保护,开始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此次钓鱼岛争端,中国准备不足,威慑不够,造成中国处于被动的局面。打破僵局需要中国制定合理的周边外交战略,以此构筑新型中日关系。日本是中国的周边国家,也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东亚安全格局需要日本积极参与。但日本的右倾化尤其是安倍的反华路线损害了中日关系,中日关系的困局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当前要维护战略机遇期,面对日本挑衅,要做好两手准备,首先是军事准备,其次是各领域的深入交流。

关键词:日本政治右倾化;中日关系;钓鱼岛;日本战略;中国的对策

中图分类号:D7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11(2014)03-0080-07

收稿日期:2014-03-10

作者简介:何晓松(1972—),男,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中日关系面临的两大问题: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都在日本的挑衅下愈演愈烈,中日关系面临困难。日本政治的变化是日本在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挑战中国的主要原因。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发展将左右未来几年中日关系的走向。

一、日本政治的右倾化

安倍晋三在2012年12月再度当选为日本首相,自民党时隔三年取得执政地位。安倍上台后提出修改和平宪法,赋予日本发动战争的权利,并抛出“侵略战争未定论”。日本政治风向急剧右转,引起日本国民和国际社会的担忧。日本政治的保守与右倾化也影响了日本的国际信誉和安倍政权的稳定。

(一)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内在成因

日本越来越“正常国家”化,20多年来“正常国家”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剧。同时,日本过去一直

振兴贸易,提高国际经济地位。但日本的经济影响力在不断弱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萧条,日本的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软实力的影响受到质疑。日本靠经济这一重要元素来提升大国地位的计划遇到障碍,尤其是当中国的GDP总量超越日本之后,日本与中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实际上战后很长时期日本都是通过经济影响力、贸易影响力、技术影响力提升其大国地位,也达到了目标。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国际地位达到了顶峰。但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日本国际影响力和经济地位快速下降。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大国地位从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日本追求大国目标并没有放松;另一方面在经济大国的上升趋势受到挫折后,日本社会的紧迫感、压力越来越大。日本试图恢复经济,但遇到了国际秩序带来的消极影响。再加上国内老龄化加速,政治和经济体制负面要素

以及结构上的僵化逐渐暴露。日本依靠经济手段提升大国地位越来越难。因此,日本逐渐转向从政治层面、安全层面,甚至军事层面提升其大国地位。

未来五年,甚至是十年,日本政治的发展趋向是右倾化的道路。其原因首先是最近十几年日本国内经济长期低迷。日本人产生焦虑、焦躁、彷徨的心理,自尊心受到损害。其次,日本跟中国对比,日本的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烈。而且日本难以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要接受这样一个现实还要更长时间。从大视野来看,东亚格局的变化,促使日本越来越把中国看做一个对手,甚至把中国作为假想敌来看待。^[1]

(二)国际结构的变化

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首先是中国持续 20 多年强劲崛起,如果中国民众支持,美国在贸易甚至政治、军事等重要领域都不能跟中国竞争。其次是由于中国崛起,美国衰弱,特别是最近几年中美在军事领域力量的对比变化,日本开始怀疑美国对日的安全承诺。

美国正在调整其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前沿存在,把基地迁到关岛等中国打不到的地方。将来随着中国战略性军事打击力量的发展,美国会让出西太平洋地区。因此,日本人怀疑,甚至认为美国不会冒着自杀危险保护东京,这是国际政治的结构性问题。比国际政治结构变动更频繁的是形势性的,日本非常害怕 2010 年 9 月的钓鱼岛危机,以及 2012 年 9 月中国全民参与的保钓行动,把中国威胁论鼓吹到极点。朝鲜半岛局势也很紧张,朝鲜发展核武器,朴槿惠上台后日韩关系因领土、历史等问题急剧变坏。因此,美国对日的承诺越来越空洞,日本越来越恐惧。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日本来说有鼓舞和吸引作用。东南亚部分国家跟中国争的是南海,日本跟中国争的是东海,日本和东南亚自然就加强了联系。印度跟中国有合作,矛盾也很深刻。

日本的对外政策几乎无效,所以日本向美一边倒,但是美国对日承诺的坚定性是可疑的。日本对美国很重要,因为日本是美国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军事盟国。但是中国对美国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中国对美国来说已经比日本重要。中国有 13 亿人口,日本人口是 1.2 亿,日本竞争不过中国。

二、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一)日本外交的转变

在这种困难情况下,主导日本对外政策的领导人寻求外交战略的转变。日本民主党失败了,更右的日本维新会兴起,这都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社会思潮保守化的结果。日本外交战略的转变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是重提价值观外交。战后日本强调和平主义,但日本的外交不是价值观外交。和平主义失败后,日本人认为和平主义、自由主义没有给日本带来一点好处,日本越来越弱了。^[2]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选民选安倍做首相。安倍的外交战略还是成功的,他多少次表示要跟习近平举行最高会晤,其实根本不是要改善关系。安倍要做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抗中国,两国吵架,全世界都在看着,他主要是影响观众。安倍的目的是要让美国重视,因为美国的政策是绝对不要中日冲突,日本在美国方面取得了好的效果,因此中国不能低估安倍的战略才能。

在日本同中国对抗的政策操作中,安倍争取不跟中国冲突,然后摆出各种各样的姿态影响美国,影响中国的周边国家,到目前为止安倍的外交战略是很成功的。现在这个世界军事很重要,但战争不可能轻易爆发,平常就看外交。

(二)安倍的修宪战略

安倍上台后提出“打破战后政治体制”。他理解的“战后政治体制”是战后宪法规定的行政体制、教育、经济、劳动关系、国家与地方关系、外交与安全保障的基本结构等。^[3]“战后政治体制”主要是吉田茂政权按宪法第九条的规定,构建的政府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治体制。^[1]“打破战后政治体制”的内涵首先是修改和平宪法。

安倍指出,“日本宪法制定后经过 60 多年,宪法已经不能应对新的价值观和课题。如环境权、保护个人隐私等没有写入宪法,第九条也要明确写入保持自卫军,地方分权执行道州制。宪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只有日本人亲手制定才能开拓新时代。宪法前言规定‘日本信赖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公正与信义,决心保持我们的安全与生存。’这是把日本和日本国民的安全寄希望于各国的善意,而普通的国家会规定‘我们坚决保护国民的生命、财产和领土’。”^[3]

安倍“打破战后政治体制”寻找回来的日本虽然不是战前的军国主义的日本,但和战前的日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右倾势力认为,战败后,美国强行改造日本的结果是导致日本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中断。日本始终背负着侵略国家的恶名,战后历史是自虐史观,日本的和平宪法是美国强加的,日本的民族精神只能在经济大国化过程中体现出来。因此他们认为日本要做政治和军事大国,必须先巩固自己的国家认同、价值观和民族精神。而修改和平宪法是日本摆脱战后束缚,恢复民族自信的核心问题。

安倍提出“打破战后政治体制”的目的,首先是修改宪法,实现军事大国化,与美国建立平等的同盟关系。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实力如日中天之时,日本曾想摆脱美国,但美国不答应。当前美国实力下降,开始战略收缩,财政上也存在很大的困难,对整个亚太地区的控制力在减弱。日本对美国保护日本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同时它也有了更多的战略空间。安倍内阁在推动修宪的同时,也在加强军事领域的建设。他要建立跟日本经济实力相匹配、能够在世界上确保日本的利益,并能与中国抗衡的军事实力。在目前阶段日本发展进攻性武器还有一些困难和阻碍,但是它正在常规力量的建设上加大力气,以期建成“不落时代”的军事实力”。如果日本成功修改宪法,日美同盟将由“父子”关系向“兄弟”关系转变,日本在日美框架中将取得平等地位。

其次是摆脱战后束缚,真正独立自主。修改宪法后,日本会重新修订《日美安保条约》。^[4]美军将撤出日本,在日本国防中只起辅助作用。“日本将由日本人自己来保卫”,安倍的这个信念只有在成功修宪后才能实现。如果日本脱离美国保护,又受限于和平宪法,它只能采取非武装中立的政策,这是不符合日本利益的。而通过修宪和重新修订《日美安保条约》,日本就能彻底摆脱战后束缚,它可能会采取武装中立政策或与他国建立平等的相互依存关系。

再次是改变东亚的政治和安全秩序。2010年的大地震、朝鲜的核试验、日韩竹岛之争以及中日钓鱼岛之争,都增加了日本国民的不安全感。日本国民对修宪的态度也由“不能修宪”转为“修改宪法也很好”。^[5]“不在沉沦中挣脱出来就在沉沦中彻底消沉下去”,日本国民面对中国的快速崛

起,民族主义情绪逐渐高涨。日本的右倾政客利用日本国民对内对外的不安和焦躁心理,喊出建设强大日本的口号。日本右翼学者鼓吹“日本要做出更大贡献,遏制中国。日本面临两大问题,第一是处理宪法第九条和核武装问题。在宪法问题上日本已经开始行动,但却不同意核武装,连基辛格都对日本不发展核武器莫名其妙。第二是重新考虑《日美安保条约》,日本必须改变安全保障政策,探索新的力量均衡的同盟体制。”^[6]日本利用美国重返亚洲的机会,时常发表强硬的言论,吸引美国的注意力,寻求美国支持日本修改宪法。安倍宣称日本要做亚洲的领导者,在安全领域争做领头羊。在美国军事预算捉襟见肘之际,日本与美国在东亚形成军事共治。可以预见如果美国在东亚军事收缩,日本必将承担起越来越重要的军事责任。

(三)中国的对日外交

中国对待钓鱼岛问题存在重大失误,从短期态势看,目前中国的钓鱼岛对策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这折射出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的应对有问题。从长期态势看,中国的钓鱼岛对策也没有战略性。中国现在必须要做战略调整,不重视周边,不把中国周边外交至少当作和对美关系一样重要是不行的。中国的周边外交越来越困难,而且周边搞不好中美关系就永远搞不好,中美关系在2001年和2012年最僵,其中一半问题是中国的周边,东海、南海、朝鲜半岛问题等。中国重视周边外交,最终目的除了振兴中国经济之外,就是在战略上要形成一种逼使美国给中国应有的战略空间。当然还有一点,搞好周边,孤立日本。但孤立日本、孤立菲律宾是战术问题,不是总目的,总目的比这个更重要。

用战争做比较,不管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操作都有战役的阶段作用,第一战役、第二战役、第三战役,当然钓鱼岛对抗、钓鱼岛斗争绝对是超出了一般的战斗层次,是战役。这个战役有必然性,但是这个战役发动的时候,2012年9月10日、11日中国是准备不足的,所有人都被石原骗了,然后野田突然跳出来“购岛”。这个战役不像淮海战役,它的开始有突然性、袭击性。对这样的战役,尽管它包含的目的、斗争、进程很多都是符合我们历史性的总方向,但是有偶然因素,中国不能积极主动制定战略规划,所以这样的战役必然有同战

争目的不协调的方面。

因此,现在始终有一个问题,这个战役同中国的周边战略,也就是战争目的,有协调的一面,也有不协调的一面。日本“购岛”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中国的应对总是有问题,例如如何对待这个不协调的方面以及如何对待这个战役的突然性?在钓鱼岛问题上同日本经历一年多的对抗,到现在利弊在哪里?等问题。从邓小平时代到江泽民再到十六大的周边总战略,尽管里面有小的互相矛盾,但是总战略还是正确的,内在统一。但我们现在的总战略内在不统一,某种意义上说尽管中国的钓鱼岛斗争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和日本都被锁住了。中国要去处理这个战役同战争目的不协调方面,就要制定中国的周边总战略,总战略要做到内在的统一性。

另外,中国迟早要给日本一个根本态度的宣告,就是给日本、给全世界一个根本态度宣告,就是一个长远的关于日本可以是什么样的根本态度。中国要让日本人搞清楚在什么情况下,日本可以成为一个中国可接受的正常国家。还有一个根本态度宣告,中国要想清楚日本民族可以期望一个什么样的强大的中国,日本对中国的根本怀疑不是右派的怀疑,是全民的怀疑。中国要让日本明白,美国能长期靠得住吗?日本认为中国的威胁很大,它的和平主义行不通了,它要谋求发展军事。因此,中国要让其明白,日本就算搞军事化,就算发展核武器,也竞争不过中国。大战略的实施过程一定要有一个谋求缓和的对话关系,这在外交上是必要的。现在中国正在大发展,如果中国国内经济继续发展,人民支持政府的对外政策,连美国都竞争不过中国。因此,日本更竞争不过中国。

三、未来中日关系的展望

(一)中国对日外交政策的问题

日本现在有两大首要任务,第一大任务是发展经济;第二大任务是日本要处理同中国的关系,特别是缓解对抗,日本的价值观外交只会激化矛盾。日本的价值观外交其实跟日本现在的经济现实、政治现实表现相悖。安倍其实根本不是推行价值观外交,而是战略性外交。安倍鼓吹价值观外交根本缺乏合适的国际背景,美国政府对这个

价值观外交基本上不重视。日本过去的外交传统不是价值观外交,这违反战后日本传统。因此,外国对日本的价值观外交评价非常低。^[4]

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西方整体下降,中国举办完奥运会后,中日又发生撞船事件。日本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它对外方面碰到的问题就是中国,而且中国的背景不是一般的强大。现在中日之间有两个背景,一个是中国的军事力量急剧持续增长;另一个是日本战后长期走和平主义、自由国际主义道路,在和平主义思潮的浸染下,日本不会全然忘却和平主义。但是日本感到战后道路,没有得到真正的安全,没有使日本在经济上及外交上继续在亚洲突出。美国的安全承诺让日本人很怀疑。日本现在眼里只有中国,觉得中国威胁日本的安全。

回顾钓鱼岛争端,石原要购岛,使日本国内、国际上都认为他要摧毁中日关系。野田认为国有化能够保持中日关系最起码的稳定,石原在2013年4月突然宣布购岛,这时候中国政府的示威却没跟上去。在对抗形成后,中国的主流思维方式有一些缺陷。

第一,中国还是不太注意外在环境的规定作用。规定作用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美国。但是崛起的中国应怎么做、做什么,这对中国周边有极大的规定作用。第二,日本是效率低的国家,日本国内的分歧和共识是难得的,这个问题中国注意得还不太够。第三,战争有一个内涵,就是战争是一个互动过程,一方的行为影响另一方对它的行为方式,这是互动。中国不是很注意中日之间的互动。第四,国内政治的动力和制约,至今为止大家对国内的制约、国内的各种情况讨论得很不够。中国国内越来越复杂了,战略需求有国内制约,这是根本矛盾。第五,中国讲硬实力,软实力讲得比较少,特别是外交。中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GDP终于超过了日本,但中国的软实力很弱。在“吵架”的时候,在观众中中国得分不多。外交是很重要的,如果中国的朋友少于对手,那么中国再强大也没用。另外,中国的地缘特征不够明显,中国虽然比日本大,发展势头好,但是有一个难处,中国战略目标容易分散,有时候中国战略安排的客观困难可能比日本大一些。

2012年9月10日后,中国已经放弃做日本公众工作的决心。日本是自由民主国家,具有较

强的复杂性,因此中国要去做工作,有的时候重大的成就是一分一分得来的。在中日对抗情况之下,中国多数的地方政府已经放弃做日本工作。毛泽东、周恩来跟日本打过很多年仗,但他们还是认真做日本的工作。中国 13 亿人口,不能光靠政府,有时候还是要继承毛泽东、周恩来的好作风。从古到今好的战略家就是对敌人很有计谋、有战略,能团结人。中国与日本要领域对领域、地方对地方、企业对企业、人对人的交往,而且如果可以持之以恒的话应该会有作用。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播的种子有的长得好,有的长得不好,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基本就烂在地里了,到了野田佳彦这些人,就完全没有效果了,这就是播种工作受到各种不利因素影响所至。

中国也不要夸大日本对外政策的战略性。首先,一个国家没有独立对外政策,战略性很有限,中国对外政策虽然有的地方比较乱,但是战略性强;^[7]第二,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性肯定不亚于安倍;第三,中国有一个麻烦,要对付的基本问题是国外多方面的,这一点不像日本,日本现在就是与中国为敌,所以战后日本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战略性,在思维、体制、政策贯彻水平方面是不高的。但是因为它任务很集中,外面也只是针对中国,这一点加强了它推出战略政策的便利。中国因为要应对好多国家,所以受到外交决策限制。

(二)日本对中国的外交战略

日本对华战略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日本一直把中日关系看成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但是中间的层次是不一样的。日本出台它跟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这个互惠主要是经济上的互惠,就政治安全而言日本跟中国没有什么互惠,所以它捞取经济利益非常重要,这样就出现了在政治安全上对立而在经济上互惠合作这样一种局面,日本现在要坚持政经分离的原则,继续在中国捞取更大的实惠。所以这也决定了日本不愿意跟中国搞全面对抗,如果搞全面对抗必然会对日本经济关系产生消极影响,这是它不愿意看到的。从安倍的政策顺序上来看,日本现在做了优先顺序的一种调整。原来要稳定住中美两大国,但是现在中日关系出现危机,所以现在日本首先考虑的是美国,然后是周边,周边主要是东南亚、东盟国家,包括印度、澳大利亚,现在日本基本的思路是跟美国和周边国家都搞好关系,取得一定的政治

资本之后再跟中国改善中日关系。因此当前日本强化日美同盟,通过强化日美同盟牵制中国、遏制中国,强化日美同盟也是想借船出海。其次是通过周边构筑一个围堵中国的网,日本充分利用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这些年发展产生焦虑的机会,积极拉拢它们。再次是打铁还要靠自身硬,日本重振自身经济,要突破国内一些禁区。在钓鱼岛问题、在历史问题上挑战中国,这种挑战是日本要营造一种中国外压的气氛。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假想敌来看待,然后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还要制造一种外压,历史上日本特别会利用外压。它认为现在中日关系面临的一些挑战正好给日本自我松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日本可以借机强化日美同盟,同时在国内突破宪法的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这样可以让日本借机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自身存在感。日本也积极参与地区制度的构建,并开始把手伸向比较边远的地区,比如中东、非洲等地。最后就安倍来看,还是通过向中国示强,来显示出自己是一个强人,营造自己是强势领导人这种趋向比较明显。

(三)中国的对策

日本在中国整体外交格局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具有双重身份,它既与我们是大国关系,同时也是我们的周边国家,日本在中国外交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中国在处理对峙关系时要考虑到尽管中日矛盾摩擦不断突显,但是中日关系不仅仅是一个竞争的关系,还有合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强调两个大局,就是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中国有市场,日本还要跟中国学习,中国利用的空间还非常大,未来这十几年或者更长时间里,中国若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还是应该稳定中日关系,甚至利用这一关系。既然日本是我们周边国家,又是我们很重要的周边国家,那么中国还是应该稳住日本,稳住日本对于我们经营周边有非常大的帮助。

展望中日关系,可以看到几个趋势:第一,中日之间斗争与合作并存的现象一定会持续下去,而最重要的是斗争问题。第二,中日关系将来一定会走向缓和,但是要有一个合适的契机,要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岛争问题其实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应该说从中日关系整体大局来讲,一定有日本正常轨道往前发展的可能性。从长远来看,中日两国通过外交努力、通过其他方面的努力,这个问

题不至于影响中日关系的大局。另外,中日冲突尤其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这几年有几个敏感时间的事件,比如2014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2015年是抗战胜利日本投降70周年,2016年日本要举行议会选举。连续三年之内日本有可能还会利用一些时机继续做出一些动作,来干扰中国的发展问题。日本政治优先化的态势不会改变,修宪的步伐也不会停止,靖国神社问题还会作为一张牌来干扰中国。日本打破战后国际秩序,成为正常国家的目标应该不会动摇,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举动也不会停止,依靠美国主导亚洲乃至成为世界政治和军事大国的目的也不会舍弃。日本与东南亚、印度、澳大利亚等国一起构筑围堵中国地区安全网的企图也不会放弃。中国应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中国应该把握大局,保持耐心,努力创造谈判解决领土主权争端的契机,维护战略机遇期。在对日斗争中保持非常清醒的大局观,必须处理好国家发展利益和主权维护利益之间的关系,要清醒地知道国家发展利益才是最主要的利益,而主权这个问题又必须要能够符合国家发展利益,维护我们的战略机遇期。但是主权问题的高度刚性决定中日围绕钓鱼岛领土主权的纠纷短期内不可能得以解决。所以中国应该设立一个长远的目标,努力创造谈判的契机,并且延长这样一个进程,以这个时间来换取空间。日本现在利用主权问题干扰中国发展进程的动机十分显而易见,所以中国应该冷静地应对,开展有理有据的斗争,针对日本种种的挑衅言行要严格区分性质,对于涉及主权的原则性问题要高度警觉。

日本政府经常用言语方式来故意挑拨中国,对此进行冷处理或许是很好的办法。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的态势很好,只要坚持“不挑事但也不怕事”的基本原则,保持战略耐心,稳守现在既有的成果,坚持常态化的维权、执法行动,结合外交上的主动作为,中国能够稳住当前的局势。在目前的僵持阶段,包括中日在领土问题上的僵持,也是一个时间收益,将来中国与日本谈判也是为了时间的问题,只要把握大局,避免出现一些意外的事件,对中国是有利的。

第二,中国应该在周边外交领域有所作为。其实中日之间的关系从根子上讲是中美关系的问题,美国是做局的,它既然做了这个局,我们就不

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对它抱有任何期待。但是,美国的战略设计是让中日长期争斗,但又不至于破局,彼此消耗,达到牵制中国和控制日本的双重目的。所以美国在中日领土纠纷中,可能选择站在日本方面,但美国同时也兼顾中国的感受。所以当前尽管中美间的结构性矛盾日趋突显,但建立新型大国的基本条件都存在,美国对中国既牵制又避免与中国发生全面军事冲突的战略红线非常清晰。因此,中国应该加强中美多领域合作关系,中美关系搞好了,日本应该不会掀起太大的波浪。韩国和日本同样存在着领土问题,而且长期有争议,所以还是应该中韩联手保持对日压力。

第三,在军事方面,中日斗争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可能现阶段挑起全面军事冲突,作为一个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中国对日本的军事斗争应该抓紧做好。比如当前在东海方面,中国要加强军事力量,中日之间军事实力不可能单纯在中日之间作对比,因为这里面还涉及到美国的因素。仅就中国和日本来对比的话,目前中国在一些实力上还确实不如日本,比如中国的海上力量、远程战略监视的能力都要远弱于对方,但是中国也有长处,中国在战略打击方面比日本强,所以中国应该扎扎实实地做军事方面的准备,未来的中日关系必然是以摩擦为主、合作为辅的状态。从过去讲友好变成讲利益,中国要现实一点,不要单纯讲友好,现在的思维要更多换成利益、换成中国的发展,然后适当考虑政经分开。

四、结语

日本政治右倾化是日本政治发展的长期趋势,日本保守右倾势力利用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以及日本社会的封闭、划一的特性,掀起一种对外强硬,对内实施国家主义统治的群众运动。安倍利用朝鲜核问题以及中日钓鱼岛争端,大肆渲染朝鲜和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国内制造“日本不安全”的气氛。日本的新闻媒体普遍右转,左倾及中间势力受到攻击。自民党在2012年大选和2013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大获全胜,以安倍晋三、石破茂为首的自民党领导集团选定的官吏,多数和他们持相同的政治观点。他们普遍否定侵略历史,支持修改和平宪法、参拜靖国神社,这两次选举改变了日本政坛的势力布局。

日本社会的保守化倾向也在加剧,多数日本国民是战后出生的,他们没有经历过日本军国主义时代和战争。日本的老齡人口已经占国民的四分之一,社会活力的降低和社会意识的保守化,成为“日本病”的起因。多年的经济低迷和政局动荡也是极端民族主义滋生的土壤,许多日本国民赞成修改和平宪法,走国家主义的发展道路。21世纪以来,日本国民对中国的亲近感一路下滑。调查显示,2010年到2013年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国民占90%左右。在这种民意的支持下,日本领导人对中国的强硬外交可以提高支持率,他们也就敢于挑战中国。从长远来看,日本还是希望淡化钓鱼岛争端,发展全面的对华关系。中国也需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所以两国求同存异,尽快找到搁置钓鱼岛争议的方法,有利于两国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东亚各国的利益。

[参考文献]

- [1] [日]早野透. 安倍要找回的日本[J]. 世界, 2013, (3):17-20.
- [2] [日]小堀桂一郎. 克服战后体制的要点[J]. 正论, 2013, (3):77-85.
- [3] 安倍晋三的主页[EB/OL]. http://www.s-abe.or.jp/policy/constitution_policy.
- [4] [日]松本建一. 宪法改正和自主防卫——中曾根主义的先见性[J]. 明察(sapio), 2013, (1):23.
- [5] [日]竹田恒泰. 9条改正终结谢罪外交[J]. 呼声(voice), 2013, (9).
- [6] [日]日高义树. 日本核武装之日[J]. 呼声(voice), 2013, (8).
- [7] [日]佐佐淳行. 把日美同盟建成百年同盟[J]. 呼声(voice), 2013, (4):78-86.

[责任编辑:张振亭]

Japan's Right Deviation and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E Xiao-song

(*Institute of Jap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Japan's political right deviation has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causes: the conservative at home anxiously asks for the "state normorlization" to realize their dream of military power, while the the situation changes abroad, esp. in Northeast Asia, stimulate Japan keenly to play its military role in containing the rise of China. Besides, Japan can not trust the protection of America any more due to the recession of the latter these years. As for the Dispute of Diaoyu Island, China is passive and hasn't conducted powerful military deterrence. Japan is the neighbouring country and China's major trade partners. The security of Northeast Asia needs Japan's active participation. However, the right deviation led by Abe has damag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prepare for two eventualities: to be ready for military actions first, then start productive discussions.

Key words: Japan's political right deviation;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Diaoyu Island; Japan's strategy; China's countermeasure